

●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十三五”学术文库系列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潘晓玲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十三五”学术文库系列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潘晓玲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潘晓玲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11(2017. 9 重印)
(“十三五”学术文库系列)
ISBN 978-7-5605-9176-6

I. ①咏… II. ①潘… III. ①咏史诗-诗歌研究-中国-古代②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 22
②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971 号

书 名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著 者 潘晓玲
责任编辑 李逢国
责任校对 赵怀瀛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7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9176-6
定 价 64.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133
读者信箱:xj_rwj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述义	(1)
第二节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文化关系	(5)
第一章 汉魏六朝咏史诗发展历程	(10)
第一节 先秦两汉咏史诗	(10)
第二节 魏晋六朝咏史诗	(14)
第二章 唐宋咏史诗发展历程	(23)
第一节 唐代咏史诗发展历程及其繁荣原因	(23)
第二节 宋代咏史诗发展历程	(48)
第三章 唐宋咏史新变及与通俗文学关系	(56)
第一节 晚唐咏史之雅俗分野	(56)
第二节 晚唐俗派咏史诗与讲史、历史小说	(63)
第三节 南宋咏史之雅俗交融	(68)
第四章 唐宋咏“列国”“三国”诗与历史小说	(73)
第一节 元明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及诗文融合的叙事模式	(73)
第二节 唐宋咏“列国”“三国”诗的文化特质及影响	(83)
第五章 传播与接受(一):咏史诗的雅俗消长与小说文体的雅俗 嬗变	(97)
第一节 咏史诗在历史小说中的雅俗消长	(97)
第二节 由咏史诗之消长看“列国”系列小说之雅化	(108)
第三节 化俗为雅的文学意义	(114)
第六章 传播与接受(二):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双向涵摄	(120)
第一节 叙事批评的构建——咏史诗在历史小说中的艺术功能	(120)
第二节 叙事者独特话语的建立——历史小说对咏史诗的反向涵摄	(131)

第三节	咏史诗进入历史小说的文学意义·····	(137)
第七章	个案研究(一):胡曾《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144)
第一节	讲史、历史小说中的胡曾咏史诗·····	(144)
第二节	俗文学地位的确立·····	(165)
第三节	影响渐微的原因·····	(169)
第八章	个案研究(二):周静轩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174)
第一节	周静轩生平·····	(174)
第二节	静轩咏史诗与历史小说·····	(178)
第三节	“三国”系列小说嬗变视野中的静轩咏史诗·····	(196)
附 录	·····	(201)
附录一	周静轩咏史诗辑佚·····	(201)
附录二	元代历史剧中的咏史诗·····	(210)
参考文献	·····	(213)
后记	·····	(222)

绪 论

咏史之作在中国诗史上源远流长。东汉班固首以“咏史”标目,以诗叙史,开创体例;左思《咏史》八首以联章组诗的形式开创一代新风。自此,咏史一体沾溉后人,创作蔚然成风。题材日渐多元,诗旨亦趋深入,“传体”“论体”并行,纯粹咏史趋向咏怀。入唐后,咏史诗逐渐大放异彩,于晚唐全面成熟,体例兼备,名家辈出。宋代咏史承晚唐余绪,求新求变,翻案出奇,终而自成一家。其后金元明清,咏史之风方兴未艾,流绪所及,千又百年,魅力独具。作为古典诗歌的体式之一,咏史诗属于雅正文学范畴。但在传播过程中,却对宋元讲史话本、元杂剧、明清历史小说、明清传奇等通俗文学创作以及蒙学教育均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二者虽分属雅俗文学阵营,具有不同的文学特质,但互动频繁,关系匪浅,二者之间广泛而长久的互动已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雅正与通俗,吟咏与叙述,传播与接受,竟成文学史上一大奇观。如何总结其间不绝如缕的文化关系,即成为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本书即以咏史诗(以唐宋咏史诗为主)与历史小说(以元明清历史小说为主)为对象,探讨二者在文化层面的双向涵摄,以加深对雅俗文体关系的理解。

第一节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述义

咏史诗是一种在题材内容、审美旨趣等方面均具有独特艺术范式的诗歌类型,“体”“题材”“样式”等指称或失于片面,或流于笼统,有不少学者认为其有足够的资格获得独立的“体裁”之定义。如许钢在《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一书中即阐明了将咏史诗确立为一种独立体裁的合理性。按照阿拉斯代·福勒(Alastair Fowler)《文学的类别:体裁与样式理论入门》中列举的文学作品中可被用来按照体裁加以组织的十五种特征,即一部作品的表现方面、外部结构、篇幅、题材、价值观念、情调、态度、人物、行动类型以及风格,完全有理由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宫体诗、山水诗与边塞诗以及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喜剧、田园诗、骑士抒情诗等视为独立的文学体裁。而咏史诗与它们并无本质不同,具有足够资格获得“体裁”之定义,且“咏史诗这一体裁的确认不仅代表了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创作、欣赏与批评传统的一种慎重严肃的学术态度,而且使对于这一类独特的诗歌作品——其独特性

不然就可能被埋没了——的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成为可能”^①。

对于“咏史诗”概念的界定,虽然尚存争议,但大致不出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定义之前,有必要厘清几个问题。

一为咏史诗与怀古诗的关系。初期的咏史与怀古写作缘起本自不同,内容、旨趣等亦有差异。“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②，“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③，一为阅读史书而兴感寄慨，一为经临古迹以抒情言志。但随着文学的发展,二者之融合、互渗趋势日益明显。对于二者关系,学界看法亦自不同,有分而论述者^④,有合而为一者^⑤。而从整体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既然二者之互融不可避免,再强分彼此,实无多大意义,如学者李翰说:“咏史诗初期乃诗人读史而兴感慨,以韵语铺陈史事以鉴戒讽诵或借史抒发个人用世情怀;而怀古诗是由山水行役诗衍生而来,重在抒发感怀叹逝之情。咏史、怀古根本之别乃其内容、旨趣之异。怀古诗的出现影响到咏史诗的写作,随着二者的融合、互渗,对后代那些兼具咏史、怀古特征的诗歌再强分彼此,实无多大意义。”^⑥因而,本书所涉及的“咏史诗”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咏史诗与怀古诗。

一为咏史与典故的区别。咏史诗以历史人事为吟咏对象,而其所隶属的古典诗歌又多以古人事迹为典,类似咏史。但实际上,无论是从审美内涵还是文体地位来看,二者都存在着差异。“运用典故的目的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以历史人物替代当今人物,以历史事迹证明当今事迹,因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迹在诗歌中是没有独立意味的,要紧的是替代与证明”^⑦，“而咏史诗则不然,所咏历史人物是具有主体地位的”^⑧,所论为是。本书对咏史诗进行统计时,即有意避免二者

① 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台湾)水牛出版社,1997版,第4-5页。

②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③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如施蛰存云:“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施蛰存《施蛰存文集·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降大任云:“咏史诗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材料发端来创作的,怀古诗则需有历史遗迹、遗址或某一地点、地域为依托,连及吟咏与之有关的历史题材。”(降大任、张仁健《咏史诗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页)另如刘学锴云:“咏史多因事兴感,重在寓历史借鉴之意;怀古则多触景生情,重在抒昔盛衰之感。前者较实,后者较虚;前者较具体,后者较空灵。”(萧涤非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8页)

⑤ 如袁行霈、彭卫等。袁行霈指出:“怀古诗和咏史诗是既有区分又很接近的两类诗。大体上说,怀古诗是能够引起古今相接情绪的时地与事物兴发感慨。咏史诗则无须实际事物做媒介,作者直接以史事为对象抚事寄慨。由于两者都是咏‘古’,又时有交叉,界限并不很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彭卫则云:“从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历史上大量出现的‘咏史’‘怀古’诗看,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借鉴和慨叹,实与虚,具体与空灵,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怀古就是咏史,咏史亦即怀古。”(彭卫《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第18页)

⑥ 李翰《试论咏史、怀古之关系及其诗学精神》,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65页。

⑦ 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4页。

⑧ 同上,第125页。

的混淆。

综合各方面观点,本书暂采用广义咏史诗的内涵,“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凡是以某一(或某几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为题材,对之进行歌咏、评论,藉以抒泄感情,发表见解的诗歌,皆可称作咏史诗”^①。“只要一篇诗作以历史作为其主要题材,作为直接吸引了诗人主要关注的焦点,而使其他的题材、关注与情感全部成为间接的、派生的或次要的,这一诗作就可以被视为一篇咏史诗作品,虽然它可能同时也还属于另外的体裁。”^②而咏史诗所据以定义的历史人事,必须在诗人创作其作品时已经成为历史。换言之,它不仅必须在今天对我们而言是历史,而且必须在当时对诗人本人而言亦已为历史。

咏史之作,在中国诗史上源远流长。它肇始于《诗经》,东汉班固首以“咏史”标目,虽被讥为“质木无文”,但毕竟开一代新风。随后左思、陶渊明、颜延之等人都有名篇传世。梁代萧统编《文选》时特立“咏史”一目。此后,咏史诗创作蔚成风气,代不乏人,但发展缓慢。自先秦至南北朝,咏史一体虽已确立,并有“传体”“变体”之分,但几百年间,作品数量少,题材范围窄,艺术上高水平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只是由咏史渐趋向咏怀,并出现咏史组诗的创作形式,为后世提供了借鉴。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沉淀,咏史诗在唐代逐渐大放异彩,更在晚唐全面成熟,名家辈出,众体兼备,成为花团锦簇、繁星璀璨的唐诗苑中一朵奇葩,为其增色添彩。据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的咏史诗约有三千首^③。初唐有陈子昂追踪“正体”;盛唐李白、杜甫以“变体”取代“正体”;中唐刘禹锡承前启后,担当桥梁重任;晚唐更是名家辈出,异彩纷呈。李商隐、杜牧如二峰并峙,取得了咏史诗创作的最高成就。更有胡曾、周昙、汪遵、孙元晏四位专职“咏史”诗人,创作了大量咏史组诗,为晚唐诗坛平添异彩。可以说咏史诗代表了晚唐诗歌创作的主流。在诗歌体式上,唐代咏史诗也“经历了由古入律,又由律体入绝句的发展历史,同唐诗的整体演进规律之间呈现出同步性”^④。宋代咏史承晚唐余绪,迈入新的阶段。虽有“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的尴尬^⑤,但终能另辟蹊径,求新求变,翻案出奇,呈现出立论新颖、见解卓识的新面貌,在咏史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 陈文华《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第68页。

② 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第6页。

③ 因对咏史诗内涵的定义不同,学界对于唐代咏史诗的数量统计也有不同结果,有约一千四百四十二首(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台湾〉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两千六七百首(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一千五百多首(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等不同数目。

④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62页。

⑤ [清]蒋士铨《辩诗》,[清]蒋士铨著、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86页。

所谓“历史演义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概念在学界也一直颇有争论，其内涵与外延亦有不同看法。本书暂采用“历史小说”的概念，指“敷演史传，偏重叙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而又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小说”^①。

历史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一大类型，是古代最早出现，也是最快走向繁荣的通俗小说。它上承唐代变文、宋元平话，开创了古代小说发展的新时期，确定了其向长篇章回小说发展、迈进的新方向，也带动了其他类型小说的产生和兴起。元明清时期，历史小说大盛，与其他类型的小说共同推动明清小说取得了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历史地位。其数量众多，成就卓著。以明代为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小说家们群起仿效，以三国历史为中心向两头扩展，上溯盘古开天地，下至明代开国历史，无不在小说家的笔下展现。根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著录书目统计，明清两代面世的历史小说约七十余部。其中明初至万历前期约有十部，万历前期至清顺治年间约有四十余部，清康熙元年至乾隆末年约有十五部，至清末约有四、五部。有些朝代的历史还被小说家们反复演述，形成了系列小说，如周前系列、列国系列、两汉系列、三国系列、隋唐系列等，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

本书所涉及的“列国”系列小说和“三国”系列小说是元明清历史小说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在明清时期历史小说中较有特色，是历史小说的一大流派——“羽翼信史”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古代通俗小说创作的兴盛与繁荣和小说艺术的发展与成熟等方面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列国”系列小说包括[明]余邵鱼《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本）、[明]余邵鱼《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八卷本）、《片璧列国志》、[清]杨庸《列国志辑要》、[明]冯梦龙《新列国志》、[明]冯梦龙著 [清]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②“三国”系列小说包括明嘉靖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万历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①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关于历史小说、历史演义，另有不同定义。有的认为“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有的认为“历史演义就是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敷演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义理的小说。它以尊重历史事实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同时又艺术化地融合史实和想象，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上有一定的创新和发挥”（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按：本书据以研究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八卷本）、《片璧列国志》、《列国志辑要》版本分别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万历己卯刊本、明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丙午重刊本、金阊五雅堂刊本、四知堂刻本，《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分别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排印本。下文论及，只标明卷、回、则或页数，不再另加说明。

明万历汤学士校本《三国志传》、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清大魁堂刊本《三国志演义》^①。

第二节 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文化关系

一、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文化关系

唐宋咏史诗尤其是晚唐咏史诗与宋元讲史、元明清历史小说关系匪浅。一方面,前者为后者的创作提供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学参照,对其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后者在体现出对前者历史意识和理论内蕴的依附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前者的传播,为其赢得了广大的受众群体,使其逐渐摆脱传统精英阶层情感世界的束缚,在俗文化层面开辟出新的天空,具备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唐代咏史诗尤其是晚唐咏史诗为元明清历史小说广泛征引。在艺术表现上,唐代咏史诗可分为典雅与通俗两派,二者不但体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对元明清通俗文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尽相同,其文学性的高低往往与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地位成反比。前者遵循“诗言志”的潜规则,因契合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而赢得了多数传统士人的肯定,以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为代表;后者则逐渐背离传统诗歌审美规范,以通俗浅白为尚,虽备受“雅”文学恪守者诋诮,但却得到了通俗文学的青睐,以晚唐咏史四家(胡曾、周昙、汪遵、孙元晏)等为代表。而从整体上来看,唐代咏史诗出现了由感性而理性、由雅正而通俗的转变,“史”成为客体被打量评判,更大程度上成为诗材而非个人情怀之寄托,这虽与“诗言志”的文化传统逐渐背离,却使其在元明通俗文学中开辟出自己的文化天空。以被征引最频繁的胡曾《咏史诗》为例,其总体艺术水平不高,立论多浅切直白,但因其“通俗性”而被宋元讲史、元明清历史小说等广泛征引,且引用的数量、频率远远大于杜甫、李商隐、杜牧等名家的咏史作品,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宋元讲史话本、元明历史小说中,只要描写的时代在胡曾《咏史诗》吟咏的范围之内,每至关节处便加以征引,几乎成为一种定式或套路,甚至有因胡曾咏史诗不够引而托名伪作的现象,与俗文学可谓关系匪浅。关于这点,后世学人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郑振铎曾说:“他(胡曾)的《咏史诗》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的可泣可歌之事,像《夹谷》:‘夹谷莺啼三月’

① 按:本书据以研究的“三国”系列小说版本分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明嘉靖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万历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明万历汤学士本《三国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排印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排印清大魁堂本《三国志演义》。下文论及,只标明卷、回、则或页数,不再另加说明。

天,野花芳草整相鲜。来时不见侏儒死,空笑齐人失措年。’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①莫砺锋也认为其在雅文学范畴内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俗文学的转化得到了补救^②。也正是这种与古典诗歌审美规范的背离,使胡曾成为“真正的民间诗人”^③,成就了其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他如周昙、汪遵、孙元晏等人的咏史诗性质类似。而这些为“雅”文化恪守者所轻视的“俗”派咏史诗也因之成为雅俗文学交流、互融的桥梁。可见,“通俗”是构成俗派咏史诗对元明清历史小说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其与历史小说之间的互动是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现象。

宋人咏史诗与讲史、历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关系亦值得关注。一方面,宋代讲史大盛,流风余韵,及于诗歌,促进了咏史诗创作的繁荣,为其提供了诗材,宋代咏史颇有以讲史内容、人物入诗者,亦曾出现模仿讲史体例之作;另一方面,宋人咏史诗为讲史、历史小说大量引用,其尚意重理的文化特质与历史小说宣扬教化、推崇伦理的特点体现出一致性,二者之间亦呈现出深层文化层面上的互动。

整体上看,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之间实现了文化层面的双向涵摄。唐宋咏史诗在历史小说中长久而广泛地存在,是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较之小说中的其他诗歌类型,它们更多作为一种非情节因素而存在,承担起叙事、评价等艺术功能,构建起独有的叙事批评。而创作主体对咏史诗的运用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体意义上的引用阶段,通过对咏史诗的改用、化用来传达主观情志、审美旨趣等。在这种由征引到改用、化用的过程中,咏史诗的审美旨趣或被承袭,或被改造,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也逐渐由模糊至明晰,形成独特的叙事话语。

如此种种,都表现出二者关系匪浅,是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现象。

二、历史回顾

针对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之间的文化关系,学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 晚唐咏史诗是否为宋元讲史之祖

张政烺是第一位对胡曾、周昙等晚唐咏史诗人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其《讲史与咏史诗》是第一篇对晚唐咏史组诗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力作,创意颇多。张政烺认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419页。

② 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③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17页。

为后世的讲史平话即由晚唐咏史诗演变而来。通俗演义始于罗贯中,乃仿平话而作之大众读物,不是专为说话之用。这篇文章是历来论咏史诗与俗文学关系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后来面世的相关论述,多不脱此篇文章范畴。

美国学者克伦普(James I. Crump)《平话及三国演义的早期历史》^①一文认为《三国志演义》的蓝本为《三国志平话》,而平话之祖即为咏史诗。程毅中也认为“周昙《咏史诗》与讲语相结合是唐代出现的新气象,它与宋人讲史的关系,很值得研究”^②。

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如克伦普(James I. Crump)《平话及三国演义的早期历史》的译者就认为平话之祖并非咏史诗。任半塘、胡士莹、(台湾)李宜涯等亦不认同张氏论点^③。

(二) 胡曾咏史诗与历史小说的关系

晚唐时期,咏史大盛,成就卓著。其中胡曾首以咏史名集,地位突出,其咏史诗内容通俗,立意浅显,为宋元讲史、元明历史小说大量引用,对通俗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学界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予以探讨。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章中初步探讨了以胡曾《咏史诗》为代表的晚唐咏史诗与俗文学创作的关系。提及《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无不引入胡曾《咏史诗》,对民间俗文学的创作起了促进作用,他认为胡曾是“真正的民间诗人”^④。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从文学发展史的意义上第一次着重论述了唐末的四个“专职”咏史诗人——胡曾、周昙、汪遵、孙元晏,对他们咏史诗的写作目的、艺术价值以及对后世影响等方面均作了较公允的评价^⑤。莫砺峰《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第四部分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分析晚唐时期大规模地写作咏史组诗对其艺术水准的影响。第五部分以胡曾咏史绝句为例,分析大型咏史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总体艺术水准虽然不高,但其在雅文学范畴内艺术价值的欠缺通过俗文学的转化得到了补救,所以仍是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现象^⑥。(中国台湾)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及胡曾咏史诗与平话小说、《列国志传》《新列国

① 1951年发表,后发表于台北《中外文学》,民国六十六年(1977)二月,第6卷第2期。

② 程毅中《重读〈讲史与咏史诗〉》,《程毅中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0页。

③ 如胡士莹先生在讨论讲史的起源和发展时指出,讲史始于何时,未能确考,但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讲史渊源于唐代民间讲说的历史故事,一是认为讲史渊源于晚唐咏史诗,如著名的胡曾、周昙等人的作品。胡士莹先生认为第一种说法正确,而第二种说法值得商榷(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5页)。任半塘、李宜涯相关观点见任半塘《唐声诗》第九章《杂吟与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83页;(中国台湾)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第183页。

④ 同上,第417页。

⑤ 张浩逊《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⑥ 莫砺峰《唐宋诗歌论集》,第168-177页。

志》《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东西汉演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较为粗略。陈蒲清《浅谈咏史诗的文化背景与胡曾诗的历史地位》一文,也较全面地评价了胡曾咏史诗的历史地位,认为其诗尽管有拘泥史料、立意平直、句调雷同等缺点,但对后代诗歌特别是宋代诗歌有一定影响,还影响了通俗文学,得到了民间的认可,是古代诗人中较为少见的^①。

其他如赵望秦、易重廉、李晓明等对胡曾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三) 唐代咏史诗与历史小说个案研究

1. “列国”系列

(中国台湾)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一书中有专节对胡曾咏史诗与《列国志传》《新列国志》的关系进行探讨。李小菊《叙述者与吟咏者——论历史演义与咏史诗》一文以《新列国志》为具体研究对象,从悠久而发达的咏史诗传统和历史类童蒙读物的普及两个方面解释明代历史演义中出现大量咏史诗及多用七绝咏史的原因^②。

2. “三国”系列

不少学者认为唐代咏三国诗对《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尊刘贬曹道德倾向的形成等都有一定影响。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认为,唐人咏三国诗是《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而唐诗被引用,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③。叶胥、冒斡在《唐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一文中也认为,吟咏三国历史人物的唐代诗歌,对罗贯中的创作思想、素材提炼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如唐人咏诸葛亮、刘备的诗篇,为《三国演义》中两人的艺术形象提供了政治、道德和美学层面的借鉴;咏曹操诗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复杂性格的刻画,具有深刻影响。他们认为“这些诗篇虽然为《三国演义》直接提供的素材有限,但诗人的思想感情对《三国演义》作者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诗歌中的艺术形象,在启发《三国演义》作者的艺术构思、开拓艺术想象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④。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在全面考察唐代诗人笔下的诸葛亮形象后,认为罗贯中突出地描写诸葛亮及其故事,在思想上承袭自杜甫《蜀相》《咏怀古迹》(五)与胡曾《南阳》《泸水》《五丈原》等

① 陈蒲清《浅谈咏史诗的文化背景与胡曾诗的历史地位》,《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② 李小菊《叙述者与吟咏者——论历史演义与咏史诗》,《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④ 叶胥、冒斡《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5页。

诗意,所引用的唐人诗作,也成为小说中艺术描写的组成部分^①。易重廉《浅论胡曾的咏史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探讨了胡曾咏三国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最先给三国故事定下拥刘反曹倾向基调的应推胡曾。其中有些说法尚可商榷,但注意到胡曾咏史诗的影响还是可取的^②。关四平认为唐人咏三国诗对《三国演义》创作提供了文化观念的借鉴,增添了小说的诗意美^③。

前贤时彦留下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但仍有不少问题需待解决。

首先,唐宋咏史诗成就卓著,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雅俗分野、雅俗交融等文化新变,对后世咏史诗创作及通俗文学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雅俗两派咏史诗艺术成就的高低又往往与其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影响成反比,这种悖离现象折射出的受众心态、文化心理令人深思。

其二,唐代咏史诗创作繁荣局面的形成与唐代的世风文风、史学、科举、蒙学等关系密切,目前的相关梳理尚不够深入。

其三,唐宋咏史诗与宋元讲史、元明历史小说虽分属于雅俗文学阵营,但二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引人瞩目。对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关系,学界相关研究多为个案研究,且多集中于胡曾,具体研究过程中又多浅尝辄止,存在不少研究盲点或弱点,值得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如对晚唐咏史诗与宋元讲史话本小说的关系,张政烺、(美)克伦普、程毅中、李宜涯等都曾加以关注。但讲史话本的来源是否是咏史诗题解或注文尚值得商榷和进一步研究。另如宋代咏史诗发展与宋代讲史大兴有何密切关系?唐宋咏列国、三国诗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对“列国”“三国”系列小说创作存在何种影响?唐宋咏史诗在讲史、历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长久而广泛地存在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备哪些艺术功能?历史小说大量征引唐宋咏史诗折射出何种民族文化心理与受众心态?小说叙述主体通过对唐宋咏史诗的运用建构起怎样的叙事话语?唐宋咏史诗作为雅俗文学的桥梁的价值与意义?诸如此类问题,若不能解决,势必影响对唐宋咏史诗和元明清历史小说整体性、系统性的认识 and 把握,进而影响对咏史诗、历史小说这两种文体创作特征的准确认识 and 对其所积累的艺术经验的理论概括,影响对它们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的恰当评价。

本书以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的文化关系为论题,就是基于上述研究视域的考量。

① 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② 易重廉《浅论胡曾的咏史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第17页。

③ 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第一章

汉魏六朝咏史诗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体裁,咏史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主旨意趣、审美取向亦各不同,有较为明显的发展轨迹。从整体来看,先秦为咏史诗之滥觞期,汉魏六朝为咏史诗之产生、发展期,唐代为成熟、繁盛期,宋代为深化、新变期。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统计,汉魏六朝时期进行咏史诗创作的计一百一十五人,作品四百四十三首^①。自班固首创其体,述史言志,到左思假史咏怀,自创新格,萧统《文选》“诗类”中专列“咏史”一体,咏史诗在汉魏六朝实现了质的飞越,取得了独立诗体的资格。在本时期,咏史诗的创作群体逐渐扩大,传体、论体两大创作体式得以创立,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创作体例等方面均有所开拓,其文学史价值得到承认,为其在唐朝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先秦两汉咏史诗

一、先秦

“咏史”一体开创于东汉,但追溯其文化源头,则在《诗经》和《楚辞》时期,已肇其端^②。

①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清]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有的学者认为咏史诗是从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中的“论赞”部分发展而来，如许钢（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第 8 页）；有的则认为咏史诗是从辞赋发展而来，如叶幼明（叶幼明《咏史始于辞赋说》，《邵阳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第 1 页）。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具有咏史风格的诗有 16 篇^①。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记述周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描述了后稷、公刘、王季、太王、文王、武王等先祖事迹。《生民》记载了周人始祖后稷的诞生与其发明农业、开创祭祀的民族起源史,歌颂其功德。《毛诗正义》云:“作《生民》诗者,言其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来,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乱,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大平、制礼,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举之以配天,谓配夏正郊天焉。”^②《公刘》记载了公刘率领周人安邦立国、发展农业等历史。《皇矣》则重点赞颂文王开创丰功伟业的壮举。《毛序》云:“《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於民,而献是诗也。”《绵》《大明》也都是对先祖的颂歌。这几首诗吟咏内容从周民族的诞生直至文、武开疆称王,几乎可视为一部民族诗史

《诗经·颂》中的《那》《玄鸟》《长发》《殷武》等诗,追述了殷商民族的始祖和开国君主成汤、中兴君主武丁的功绩,以简炼的笔墨勾画殷商史事,史笔而有神话。《玄鸟》从始祖契的诞生开始,记载了成汤立国和武丁中兴的历史,描述了商人的民族起源及祖先的壮举。《长发》记载了商人的发祥史,并着重刻画了商汤的英雄形象,被称为“大禘之祭”。《殷武》写武丁伐楚,信史意味较浓。

另如《大雅·荡》《王风·黍离》等诗,带有很强的以古喻今色彩。《荡》一诗的鉴今色彩尤为浓郁: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慆德,女兴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而秉义类,强御多怙。
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女奭桀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汨尔以酒,不义从式。
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如蜩如蟴,如沸如羹。
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罔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

① 彭卫《中国古代咏史诗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② 《毛诗正义》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世界书局缩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该诗假托文王以殷商之衰亡鉴戒当世，具有托古讽今的意义。正如清人方玉润所说：“此诗自二章以下，皆托言文王叹商以刺厉王。盖臣子奉君，不敢直斥其恶，而目击时事日非，纪纲大坏，又难自忍，故假托往事以警时王。”^①而《王风·黍离》一诗为缅怀故都之作，抚今追昔，带有很强的怀古诗色彩。

《诗经》中这些具有咏史风格的诗篇或通过叙述本部族历史歌颂祖先，或通过历史事件的反思针砭时政，或通过追忆往昔奠慰先祖，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观念，体现出显著的记事性和纪实性。它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咏史诗，但其以史入诗的写作角度、托古喻今的历史意识，仍对后世咏史诗具有启迪意义。

此外，屈原的《离骚》《天问》《九章》等作品中都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其采用的借古讽今、以史证实的表达方式更使作品具有了“以古比今”的现实意义。如《离骚》中记述“三后”、尧、舜等历史上的圣明君主和夏桀、商纣等昏庸君主，在诗中又常穿插评议、咏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称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其意在借古人古事来抒发情志，表达对楚国前途的忧虑与对楚王的期望。在诗中，既有个体主观情感的观照，又有对国家命运的隐喻和象征，其渲染主观情志、强化比兴效果的特质与后世咏史诗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诗经》《楚辞》中歌咏史事的诗歌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咏史诗，但其肇始之功，实不可没。它们虽侧重复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但也不乏诗人主观情志的观照，初步具备了自觉的讽喻意识，都对后世咏史诗具有深远影响。两相比较，《诗经》中相关作品更多以史入诗，《楚辞》则更注重抒情，初步体现出“实录”与“咏叹”的区别。后世咏史诗大致可分为传体、论体两大类型，一侧重述史，一侧重抒怀，其文化源头或可追溯至此。

二、两汉

尽管在先秦的《诗经》《楚辞》中已有对史事的歌咏，但专意于歌咏史事并以“咏史”标目，则始于东汉时期的班固。

班固《咏史》一诗首以“咏史”名篇，草创其体：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①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2页。